

焦虑时代，基督徒如何成为福音的见证？

——我们对福音的信心激励我们服侍社区，即使人们认为他们并不需要。

提姆·凯勒¹、约翰·稻津²/2016年6月20日

正如天主教作家约瑟夫·巴顿（Joseph Bottum）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

社会文化飞速变化并日趋多元化，文化规范改变、人权以及宗教自由等很多问题令人焦虑。过去十年，围绕性行为、同性婚姻、跨性别者权利、公共场合的宗教行为等问题，人们的观点以及法律规范发生着迅速的转变，这些转变造成了包括基督徒、穆斯林、正统犹太人在内的大量传统信徒的焦虑。

社会经济的差距也造成了巨大的焦虑。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人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而在岗人士则面临着住房紧张、教育及医疗等问题，生活在贫困的社区之中，邻里之间彼此陌生。而且不知为何，相应政策并未照顾到中低产阶级的经济负担能力。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更可怕的焦虑在于他们发现自己无力适应社会的分化。在过去的几年，暴力事件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在威斯康星州的锡克教寺庙、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在查尔斯顿的黑人教堂、还有上周，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暴力袭击总有发生。在这些事件中，弱势群体成为暴力肆意侵犯的目标，这必然使这些弱势群体的其他成员担忧自己的安危，使他们丧失对美国的归属感。

美国的基督徒应如何成为这焦虑的时代的见证？首先我们来分析我们当下的处境，第一步就是了解我们是如何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以及我们的环境如何造成了这些焦虑。

¹约翰·稻津（John D. Inazu）：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及政治学副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文化高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著有新作《多元主义的自信：在巨大差异中生存发光（Confident Pluralism: Surviving and Thriving Through Deep Differenc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²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曼哈顿救赎主长老会的创始人、主任牧师，出版多本著作，近作《祷告：敬畏与亲近上帝的经历（Prayer: Experiencing Awe and Intimacy with God）》（企鹅图书出版）。

*翻译：杨霄靖

曾经的新教文化

英国神学家莱斯利·纽毕真（Leslie Newbigin）曾经写道：“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外在形式一贯、也必然受到其他社会现实的影响。”1941年纽毕真写下这番话的时候，美国很重要的“社会现实”之一是，社会公共规范的话语权由美国新教文化的白人中产阶级掌握，同样，很多美国人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新教教会。绝大多数美国人——且不论他们是否虔诚——委身于某个教会并认同其基本教导。这些教导本身是好的，但它使人们开始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思考宗教以及道德问题，这不见得是好的现象。直到20世纪中期，这些思考中开始有一些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声音，但也仅此而已。

很多传统规范中都有新教文化的影子，比如双亲家庭、勤俭的生活方式、社区中的优先次序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道德凝聚力使大量慈善机构纷纷涌现，并且时至今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在其引导下支撑着慈善事业。

但另一方面，新教文化漠视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不平等，甚至这种不平等有时正由新教文化引起。新教徒漠视甚至敌视宗教少数群体面临的公民自由的危机，大部分白人新教徒缺席了民权运动，导致个人及结构性种族歧视（personal and structural racism）延续至今。而新教文化的社会及法律力量也常常压制着宗教、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异见。

不同的社会现实

有些人称过去的十年为“断裂的时代”（Age of Fracture），因为移民、全球化、技术专业化等导致社会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但是正如约瑟夫·巴顿曾经说过：

“过去几十年，美国唯一最明显的现实是，主流教会（即指新教教会）作为我国核心组织，在人们的认知中的地位日渐衰落。之后我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历史变化的解读都离不开这一事实。”巴顿是对的，无论人们现今如何看待主流教会，新教文化曾经赖以生存的社会和制度框架都是它的产物。但这一框架已不复存在。由于它的缺位，社会文化迅速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路渐行渐远，

这使得人们对社会组织——商业、政府、教堂，甚至是家庭关系——信任感日渐降低。而无论是福音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世俗主义，都无法填补新教没落造成的信仰缺失。

新的文化现实导致了很多焦虑，但也为我们很多人提供了机会——在这个我们无法把控的世界中重现基督徒的见证。正如圣经希伯来书中所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而曾经新教主导的文化常常使一些美国基督徒忘记这一点。虽然我们受呼召去爱我们的邻舍，虽然我们坚持正如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教授提出的那样“活出信仰”（“faithful presence”），但人类的社会终究无法等同于上帝的国度。基督徒信奉“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 3:20】），这就意味着我们总不算是在家。

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的见证学到如何在世界中做盐做光。耶利米书讲了这样的故事，上帝使用先知教导巴比伦的犹太人，不要仇恨或漠视外邦人的城，而是要在那里久居，通过祷告操行自己美好的心意，为那城祈求平安繁荣。他们将为他们共同的幸福建设巴比伦（“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利米书 29:7】）。他们将以服侍邻舍与所在城邦的一族而广为人知。在那同时，那些上帝的子民并不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定睛于社会繁荣或者物质增加。他们会去爱并且服侍他们属地的城邦，但他们不会忘记，会有那么一天，这些城邦因其罪恶与不公受到上帝的审判。只有在上帝里，信徒才有真正的“末后的指望”（【耶利米书 29:11】）。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指望，而不仅仅是为了在巴比伦人中生存，即使曾经的美好的回忆折磨着这些巴比伦的犹太人，但他们努力着，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兴起更多神的子民，并最终彰显神的荣耀。正如生活在外邦土地上的巴比伦犹太人，基督徒一直以来都是被呼召爱邻舍、服侍他人的“客旅”，正因如此，周围人才会“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 2:12】）。

如客旅般寄居必然造成一种弱势的状态，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受到压迫。有人声称美国如今的基督徒面临着压迫，但世俗自由主义（Secular Progressive³）恐怕不这么看，甚至对于非白人的基督教徒来说这一论调也荒腔走板——实际上他们也长期处于弱势。这样说并不是掩饰教徒人口统计上的变化，也不是在否认美国基督徒遭遇的法律的滥用以及正义的缺失，但这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摆正

³ “Secular Progressive”一词中，“Swcular”指非宗教范畴，“Progressive”常指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福克斯新闻评论员 Bill O' Reilly 首先提出“Secular Progressive”这一说法，暂未找到中文译法，译者注。

心态注意言辞。

无论我们境况如何，基督徒是受呼召为国家及掌权者祷告的。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己。祂呼召我们服侍我们的邻舍，无论他们是否信主，我们要为他们舍己，正如耶稣基督对我们做的那样。

三个建立连结的例子：政治、种族和信仰自由

我们与周围世界建立连结的方式是，关照我们邻舍的实际需求。当一个社区发生不幸，基督徒应该首先站出来，付出时间、金钱以及其他资源来帮助受害人，修复社会组织结构。对邻舍的不幸，无论是瞬间发生的悲剧还是几十年积累的痛苦，我们应当以言辞以及实际行动报以同情与关爱。

有时候，爱我们的邻舍意味着参与政治。最近，《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观察指出，支持所谓“政治总是随文化而动”原则的，通常是一些有余力影响文化的人。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政治不是一种事后的补充而是当下急切的需求。尤其是在一些社会结构已然撕裂的地区，在他们的处境中，政治——法律、政府、公共机构——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决定生死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扮演的角色不应是利己主义的政客，而应当亲身参与为我们的邻舍寻求出路。当然，政治是肮脏的，很多参与其中的基督徒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在为非福音导向的人和机构做事，不过这样的合作并不需要我们认同合作伙伴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焦虑时代基督徒为福音作见证的另一个领域是，从事促进种族平等的工作。尽管很多白人为主的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但福音本身跨越种族差异为世人带来公正与和平。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历史性地打破了种族文化的鸿沟，没有其他宗教能像基督教这样跨越文化地广泛传播。

有色人种常常感到失望大于希望，但是正如泰比·安泰博（Thabiti Anyabwile）牧师所说，基督徒能够抵挡“绝望的诱惑”，哪怕“人们在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中遭受欺压与中伤，绝望如浓雾笼罩着整个社区与家庭。”曾经的大规模监禁其结果是可怕的，而同样可怕的邻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教育的不平等，就业、医疗保健的不公，这些事情仍在不断上演。基督的盼望不是盲目乐

观，当然也不是对现实的彻底绝望（只寄希望于另一个世界）。

任何种族的基督徒都不难发现，我们的一些邻舍在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等方面长期遭受政策与实践的不合理伤害。我们可以花时间去倾听我们邻舍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学会如何倾听），不要简单地设想一个所谓解决方案，也不要视其为无法战胜的挑战。不要觉得困难“太大”而逃避，当基督徒面对种族、阶级差异的障碍时，可以借助福音的力量拉近我们与经历苦难的邻舍的距离。在郊区的教堂可以努力参与到一些工作中，去理解代际不公给个人和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在城市中参与社区工作的教堂，可以为早教项目提供志愿服务，与卫生医疗不完备地区的管理者合作，在当地城市商业中投入金钱与人力，无论做什么，都应当带着顺服与谦卑的姿态（而不仅仅是看起来在“服务社区”）。

最后，基督徒也可以参与到宗教自由的相关事件中，带去我们的盼望而不是焦虑。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感觉到，他们的机构、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法律压力，这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包括：基督教校园事工出现障碍，难以走进校园；基督教收养和社会服务事工中信仰与使命遭到法律法规的挑战；教会学校面临着取消免税政策和认证困难等困境。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努力寻找相应政策、法规来回应。但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诉求以更大众化的方式公开，以寻求来自各种宗教背景以及无宗教背景的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我们无法忽视尊重每个人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没有任何法律规范或者神学研究将基督徒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关注他人的宗教自由，意味着关注他人实践自己信仰时遭遇的挑战与限制。在当下的文化潮流中，保护美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基督徒来说尤其重要。基督徒或许觉得实践信仰遭遇种种挑战，但与穆斯林遭遇的文化、法律挑战相比，基督徒身上的担子还是轻省的。正如一位穆斯林领导人所说：“在这个国家，如今的穆斯林甚至都不敢思考。”一些穆斯林个体参与了美国国内恐怖活动，这又加剧了穆斯林群体面临的挑战。尽管基督徒、无神论者也会参与到某些恐怖、暴力事件中（在像电影院、小学、商场之类的地方），但如果参与者被贴上穆斯林的标签，很多人会对此另有评判并对之更加恐惧。

贝克特基金会（Becket Fund）对宗教自由作出的工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们花费时间与金钱来保护各种信仰的人们，包括穆斯林。其他一些著名的基督

教领袖像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在他们表达自己对宗教、政治的见解时，都有相关内容恰当地回应了反穆斯林言论。而我们普通人则可以在个人层面上支持宗教自由。基督徒可以与我们的穆斯林邻舍一起参与交友活动、分享食物、为难民开放家庭或者教堂。我们可以抵制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言论，那些因为某些宗教个体的行为而谴责所有信徒的言论。正如我们抵制那些“基督徒都是偏执狂”或者“对堕胎诊所的暴力行为应当归咎于基督教教导”之类的指控，当其他宗教团体或任何族群因为个别施暴者而被贴上标签时，我们同样要迅速站出来抵制。

福音的信心

在这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信仰也许完全不同，但依靠福音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应当参与到这焦虑时代的社会中去。我们一直想说服周围的人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他们的并不正确，但这样做并不总能成功。事实上，我们有一些教义其他人难以认同，但那是我们信仰中某些重要信条的来源。不过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分歧的存在，我们依然要坚持什么是终极真理。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即使别人拒绝了我们的传教，我们依然会自信地坚持我们美好的信仰。因此，承认社会的多元化不应该被误解为相对主义，相反，福音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独特性，进而鼓励我们投身社会，完善社会机制，惠及我们的邻舍。

有基督徒把这种心态称为“多元主义的自信（[confident pluralism](#)）”。作为基督徒，我们依然可以投身周围多元化的世界，因为福音本身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们可以承认社会确实存在巨大的分化，但并不需要为此压抑或者减损我们所坚持的信仰。即使那些不与我们存有共同盼望的群体，我们也可以找到与他们的交集。

跨越差异共事也会面临着危险。杜克大学卢克·布雷瑟顿（Luke Bretherton）教授对一些可能带来危险的共事方式提出过警告。其一，参与“政治选举”（co-option），这将导致教会最终沦落为政治或社会团体吸引民众的工具；其二，与其他组织“竞争”（competition），长此以往教会就会变成与其他组织相似的争权夺利的团体；其三，“商业化”（commodification），这种模式的教会将成为为人们提供心理治疗、自我实现或一种生活方式的机构。我们想要更加被接受、想

要有更多生存空间，就必须增加门徒实践、加强教会组织性、更多地敬拜，这时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教会不是一种政党或者什么特定组织或者社会团体。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被拒绝或误解的危险。有些人认为，祷告、宽恕、信仰宣告这样的实践幼稚而无用，我们对这种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对这个世界来说，福音带来的信息一直是如此激进。福音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的盼望作为支撑，这盼望激励着基督徒带着爱与友善的行为进入痛苦与破碎之地。黑人基督徒面对种族不公依然选择了相信与宽恕，因为他们有另一个世界的盼望；各个种族的基督徒参与到彼此和解、恢复关系的努力中，因为他们另一个世界的盼望。基督徒可以与穆斯林并肩参与争取宗教自由的运动中，因为他们有另一个世界的盼望。

我们可以大胆期待，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亲自协调处理万事。我们相信祂，祂也给我们信心，正如我们之前世代代的圣徒用言行所彰显的那样，祂的恩典够用。正是这样的盼望与信心，让我们在这焦虑时代也可以投身于这个世界。